

新编地方志的当代史研究价值述论

——以北京市新编方志为例

王 蕾 李自华

提 要: 随着新编地方志的规模效应日益凸显,开发利用将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向,其为当代史研究服务的功能必将日益得到强化。北京市的修志实践表明,新编地方志的记述对象、时限与当代史的研究对象、时限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并具有体量庞大、资料丰富和记述准确等特点,能从资料提供、厘清史实、开阔思路、事件评价和记述方法等方面,为当代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

关键词: 北京市 新编地方志 当代史研究

开发利用志书,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价值所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要像开采矿山、探寻宝藏那样,把志书中的内容,根据不同需要、运用各种方法开发出来,使它们在领导决策、党和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科学研究和普及国情、地情知识中发挥作用。”^①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集中力量汇编新旧方志中有关典型事例和代表性资料,为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力支撑。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地方史编写工作。”^② 新编地方志能为当代史研究提供资料、厘清史实、开阔思路,并从事件评价和记述方法等方面为当代史研究写作提供参考借鉴。本文主要以北京市新编方志为例,探讨新编方志服务当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功能。

一 新编方志与当代史在对象、时限上高度关联

北京市编修新方志始于1958年,大规模修志于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第一轮修志规划志书172部,其中《北京志》分志154部、区县志18部,总共约1亿字,已经全部完成^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北京地情最大规模的全面调查研究和系统挖掘整理。同时,北京市于2008年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规划编修《北京志》分志66部、区县志18部。从北京市新方志编纂情况来看,新编方志的记述对象、记述时限与当代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时限大体相同,二者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一) 新编方志的记述对象与当代史研究对象高度重合

地方志,指的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根据这个定义,北京市新编方志的记述对象,是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有关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当代史,亦指广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国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④。据

① 朱佳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促进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② 王伟光《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③ 《本市第一轮172部志书全部完成》,《北京日报》2014年3月8日第2版。

④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此,当代北京史研究的是北京解放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生态等内容。

从北京市第一轮修志实践来看,《北京志》的154部分志,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部类下分自然环境、地质矿产、政权政务、政法、军事、综合经济管理、城乡规划、建筑、市政、工业、农业、商业、开发区、旅游、教育、世界文化遗产、卫生、人物、民俗方言等35个较大类别。《北京志》各分志记述的内容,同样可以成为当代北京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切入的角度和记述(研究)的方法不同而已。新方志切入的角度可以是自然的、社会的,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当代史切入的角度必须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只能是社会的,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方志的记述对象与当代史研究对象有着高度的重合。《北京志》的大部分分志,都提供了编写一部相似的当代北京史著作的方向和可能。如人口志与当代北京人口史,水利志与当代北京水利史,电力工业志与当代北京电力工业史,农村经济综合志与当代北京农村经济史,普通教育志与当代北京普通教育史。

(二) 新编方志的记述时限与当代史研究时限日趋一致

新编方志在记述时限和内容上既要体现时代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它一方面要着重记述“我国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经历的曲折路程和光辉成就,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①;同时要用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行记述。北京新编方志充分体现了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要求。

在第一轮修志中,《北京志》和区县志记述事物都从其产生之时或有记载之时记起,有的上溯至北京猿人时期,而迄于20世纪90年代。也有部分志书记述的对象是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新事物,如《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协志》《人民武装警察志》《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国营农场志》《乡镇企业志》等,其记述时限完全就是当代北京历史的研究时段。第二轮规划编修的《北京志》和区县志,上限原则上与第一轮修成志书的下限衔接,新修志书从事业发端记起,所有志书下限原则上止于2010年年底^②。由此看来,北京市第一轮修成志书虽然既有北京解放前的内容,也有北京解放后的内容,但根据志书详今略古的编纂要求,其记述时限与内容重在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时段,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新时期过渡阶段和改革开放起步、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等时段。第二轮修志的记述时限要与第一轮衔接,主要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时段,基本属于当代北京历史的时限范围。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随着新一轮修志工作的启动,新编方志的记述时限与当代史研究时限越来越趋于重合。

二 新编方志能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

资料的厚薄,是决定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北京市在编纂新方志时,深入众多图书、档案保存场所,走访知情的老领导、老同志,收集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资料。可以说,“每一部

^① 曾三 《为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而开拓前进——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6月11日第5版。

^② 《北京修志简介》,《北京市第二轮修志指导手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0年编印。

志书都是以十倍,甚至百倍的资料来支撑”^①。大量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是新编方志内容实、质量高的坚实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编成的新编方志,无疑能为当代北京史研究提供大量珍贵的一手和二手资料。

(一) 新编方志具有厚实的资料基础

北京市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收集各类档案、图书、杂志、报纸、旧志、口述、年鉴、图表、照片、音像、实物等资料。这些资料数量大,种类多,质量高,为修志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编纂《外事志》时,全市共70个处级外事部门180多人参与资料收集工作,并多次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走访负责外事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至1997年年底阅档15000多卷、收集整理资料1300多万字^②。《出版志》编修人员通过首都图书馆,国家第一、第二档案馆复印资料,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和知情人撰稿,查阅参考书目和单独访问专家等途径,收集了2900余万字资料^③。《档案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在京专门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市、区县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有关企业和高校档案馆、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全市上百个单位的150余人共收集、提供了1500余万字的档案资料^④。北京市新编方志的资料收集工作,充分体现了政府修志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编修一部方志所需的资料来源,既有国家、北京市和区县等各级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又有本部门、本系统单位的档案资料室,往往涉及十数家,甚至数十家、上百家。如此大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是一般当代史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这样收集到的资料不仅数量大,而且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重要性。修志人员将收集到的大量资料,经过筛选、消化和提炼加工,采用适当的志书体裁,以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形式出现在新编志书中,供当代史研究者参考使用。

(二) 新编方志能为当代史研究提供大量的一手资料

北京市新编方志大量使用表、图、录等体裁,为当代北京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版志》编写人员收集到有关图书出版的图片400余幅,从中选择160幅作为彩色插页,另有95幅作为随文插图,其中多数为当代北京史图片,如北京荣获首届国家图书评奖最高档次荣誉奖的图书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的书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出版的畅销书封面图片,《海瑞罢官》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诗文集》的书影,在学术界有过重大影响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在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书影等^⑤。《共产党志》有彩色插图42幅,其中与当代北京历史有关的29幅,包括1950年北京大学教师上书拥护抗美援朝,1956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等人阅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喜报,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开幕式,199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等图片。这些图片是当代北京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活动和人民生活最直观、最生动的记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场感。《物价志》一书大量使用表格来表现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市民衣、食、住、行等领域商品价格的发展演变情况,如《1950年以来历年北京市场鸡蛋年平均零售价格表》《1961—1964年北京市场高级糕点糖果价格表》《1978—1995年北京市场主要农产品零售价格变动表》《1983年北京市场国产彩色电视机销售价格表》《1988年北京市场工商企业用房租金标准》等。《中关村科技园区志》附录部分,收录了6份决定中关村科

① 段柄仁《主编的印迹——段柄仁方志文丛》,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②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619~620页。

③⑤ 赵庚奇、田耕《〈北京志·出版志〉及其编纂工作》,《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

④ 《〈北京志·档案卷·档案志〉出版发行》,《北京档案》2004年第5期。

技园区发展壮大的重要文件,如《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等。上述志书中使用的图、表、录等资料,以其丰富性、珍贵性、原始性、重要性,成为开展当代北京史研究重要的一手资料来源。

(三) 新编方志能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丰富的二手资料

北京市新编方志是在充分占有和消化吸收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述、记、志、传等体裁,对市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记述,构成志书的主体内容,为当代北京史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翔实的二手资料。北京市新编方志基本都设概述,以述论结合的方式来记述北京市(区县)或专业(事业、行业)发展变化的概貌。部分新编方志设大事记,对大事、要事、新事进行提要式记述。“志”是志书的主体部分,按篇、章、节的组织架构对历史与现状进行记述。“传”即人物传记,记述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新编方志中述、记、志、传等部分的内容,为研究当代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直观的、总括性的认识。《妇女组织志》记述了上至清末1906年下迄1999年近百年的北京妇女组织、妇女活动和妇女工作的发展脉络。《规划志》比较完整地记述了有史以来至2000年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概况。《宗教志》系统记述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在北京传播发展、教派传承、宗教文化以及宗教事务管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施、宗教界为社会服务等内容。《人物志》收录人物约15460人,人物传略900余人,列表人物470余人,名录人物14130人,相当一部分是与当代北京史有关的人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副市长以上的领导人均有传略^①。

一部部志书,就是一部部关于北京市(区县)或专业(事业、行业)发展变化“百科全书”式的记述。当代北京史研究者从中可以找到丰富的参考信息,如行政区划沿革、古今地名对比、地区发展大事、各行各业发展概况、组织机构沿革、机构领导名录、重要历史人物传略、地理形胜、地方物产、自然灾害等。研究者可以就当代史某一选题从志书中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和研究线索;也可以就某一事件、人物或行业从志书中知晓来龙去脉,作概括性的把握,并以此为基础或参考,进一步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收集更多的资料,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

三 新编方志能为当代史研究写作提供重要借鉴

经过第一轮修志,北京市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严谨、操作规范的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成为地方志工作不断推进、志书质量不断提高的根本保证。每一部新编方志的编纂,都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来开展,充分吸取各方面的意见,确保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无误、体例完备、特色鲜明。这样修成的新编方志,能从史实考订、专业见解、历史评价和写作手法等方面,为当代北京史研究写作参考借鉴。

(一) 新编方志体现出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北京市新编方志从指导思想、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志书验收和修志队伍等环节牢牢把好质量关,既讲求思想正确,又体现科学精神。指导思想方面,新编方志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工作体系方面,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行之有效的体制。制度体系方面,成立市、区县两级编委会,由行政首长担任主任;实行全市统一规划、

^① 谭烈飞《京华春秋话人物——从〈北京人物志〉的编纂解读北京人物》,《北京档案》2014年第6期。

统一审定制度和主编负责制；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制定规划、搜集资料、选聘人员、志稿审定、出版发行、资料归档等工作流程。志书验收方面，制订“五项标准”（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点鲜明、文风端正）、“三审制”（初审、复审、终审）和“三校制”（志稿三校），保证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印刷出版质量。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北京市及时出台《实施办法》，地方志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①。修志队伍方面，老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比较成熟又相对稳定。既有业务精通、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同志，有一大批中青年骨干和勤奋刻苦的修志工作者，又有熟悉各部门、各行业的兼职修志人员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

北京市新编方志的编纂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要求，历经筹备、搜集资料、初稿撰写、征求意见和送审等程序，往往费时十数年进行撰写和修改才付梓出版。《外事志》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承编，经过以下几个工作阶段：筹备阶段，1996年1—8月，成立编纂委员会，经过10余次调整修改确定志书篇目；收集资料阶段，1996年9月至1998年，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资料收集工作；撰写志稿阶段，1999—2000年，由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撰写北京解放前的外事内容，市外办外事志办公室负责北京解放后的时段；志稿合成和修改阶段，2001年至2006年9月，召开9次专题座谈会，听取对《外事志》现代部分志稿的意见，并与历史部分志稿合编总纂，形成评议稿，先后召开评审会议和市外办主任办公会，后送《外事志》编委会审查，修改形成送审稿；送审阶段，2006年9月—2008年8月，送审稿报请《北京志》编委会及中央有关部门审批，修改形成送审二稿后报请《北京志》编委会审批，修改形成审定稿后送请各位主编、副主编及编辑审阅，于2008年8月经《外事志》编委会及市外办主任办公会批准，报请《北京志》编委会审印^②。像《外事志》一样，每部新编方志都要经过层层严格把关，如资料关、编写关、评审关和出版关等，要经过方志主编、方志专家、专业学者、部门领导、部门专家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的审阅检视，其思想立场、学术观点和资料史实等都是过得硬、站得住的，可以为当代北京史研究写作提供重要的借鉴参照。

（二）新编方志对当代史中一些模糊史实作了考订

北京新编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常常用到“考”这种体裁，多方查找档案资料，反复比对核实，对一些模糊、相互矛盾，甚至错误的史实进行考订，弄清楚事物、事件或人物事迹的本来面目。这项考订史实的工作，同样是当代北京史研究要解决的难题。新编方志对这些疑点的考订，有助于填补当代北京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或厘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如《出版志》编纂过程中，一些出版社给编写组提供的简介材料中，部分建社年代、创始人等信息出现错误。编写组找到1952—1958年72家出版社递交北京市新闻出版处的《书刊出版业营业申请表》，表中对各出版社的名称、建社年月、首任社长、总编、编辑人员情况、出书范围、社址、所有制性质、资金总额、出版情况、上级领导单位等，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既盖有公章，又有上级单位的证明，还有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审核的批示，另有发给出版社的营业许可证与回执。编写组据此整理出《20世纪50年代北京地区图书出版单位登记一览表》，纠正了出版社提供的材料中出现的差错^③。长期以来，关于1965年因战备建立档案后库的情况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清档”事件的前因后果，一直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档案志》编写人员通过召集知情人座谈会和向有关单位打

① 《第一轮修志工作的回顾和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意见——段柄仁同志在北京市第六届地方志编委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北京市第二轮修志指导手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0年编印，第96~97页。

②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外事志》，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619~621页。

③ 赵庚奇、田耕《〈北京志·出版志〉及其编纂工作》，《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

电话、发函调查等办法收集资料，在分析甄别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清楚了这两个问题，并在志书中作了正确记述^①。

（三）新编方志对当代一般历史现象提供专业见解

《北京志》各分志的编纂工作，按其专业（事业、行业）所涉，往往会落实到某个职能部门，或以一个职能部门为主、多个部门共同参加。这些部门在编纂方志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就当代一般历史现象提出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不是编纂者的主观认识和结论性评述，而是从资料中捡拾或概括、归纳得来，是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并自然而然地融于记述之中。由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承编的《房地产志》，在写到“大跃进”时期人均住宅面积下降、住房紧张时，分析其原因为“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思想指导下，住宅建设比重下降，住宅投资缩小，造成生产工作用房与生活居住用房的‘骨头’与‘肉’的比例严重失调”。当写到1970年人均居住面积在住宅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不降反升时，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很多机关被强令外迁或撤销，大批干部下放，大量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外迁，大学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②。由北京市财政局承编的《财政志》，在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市财力物力紧张时，分析其原因为“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大、小三线，加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社会动乱，不少建设任务不能如期完成，部分审批权限下放给地方，地方自筹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当写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税源逐年增加、工商税收稳定增长时，指出其原因是“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三资’企业不断增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也逐步兴起”^③。新编方志对当代历史现象提出的专业观点和见解，增进了研究者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认识，为研究者解释和研究这些历史现象提供了重要思路。

（四）新编方志为当代历史重点、难点事件的研究写作提供重要参照

北京市新编方志按照“求真存实”“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对当代北京历史时段中的重点事件，特别是一些难点事件，做了既讲原则又富有技巧的处理，为当代北京历史研究重点、难点事件的研究写作提供重要参考。北京市的新编方志许多是出自包括党史、历史等学科的专业学者之手。他们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往往要查阅大量的原始资料，要对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并且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认真编写完成的志稿，还要通过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的评审，同时报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审查，其中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新编方志对当代北京重点、难点事件研究写作的参考作用，主要表现在历史评价和写作手法等方面。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承编的《共产党志》，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方面，《共产党志》概述部分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对当代北京重点、难点事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改革开放前30年，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曲折失误在北京市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反映，成为当代北京历史研究写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共产党志》对这些难点事件作了全面、客观、恰当的记述，特别是指出了缺点失误所在。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① 杨红军《呕心沥血磨一剑 众手编修档案志——〈北京志·档案志〉编纂始末》，《北京档案》2004年第5期。

② 陈华《首轮〈北京志·房地产志〉的编修对续修志书的借鉴意义》，《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2期。

③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财政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0、276页。

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伤痕”；“在‘大跃进’氛围下提出的高指标，严重脱离经济建设的实际，造成农业、工业和城市建设的严重损失”；记述“文化大革命”时，既写它造成的严重灾难，同时也指出“北京的党员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就从未间断过”，“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生产排除干扰从事首都的建设，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志》述而不作的写作手法，为当代北京历史中一些时间比较近的难点事件写作提供了重要借鉴。陈希同、王宝森案件的发生，使北京市级领导班子声誉蒙受重大损害，给北京市的工作造成很大困扰，而案件本身则成为当代北京历史中的敏感事件。《共产党志》记述“陈王案件”时，简明扼要地写清楚案件概况，只写事实，不作评论，寓道理于叙述之中。字里行间明确，陈希同等人主要是经济犯罪，是他们个人的腐败问题，并未牵涉改革开放等领导工作问题，不能因他们出问题而抹杀北京市改革开放的成绩^②。这种平和的记述，虽然多一些平淡、朴实，少一些生动、鲜活，但不失为写作当代历史敏感事件比较理想的方法选择。

随着第一轮修志工作的结束和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全面进行，新编地方志的规模效应日益凸显，开发利用将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向，其为当代史研究服务的功能必将日益得到强化。同时，随着当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历史研究者对新编方志将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充分的利用。由此可见，新编地方志在当代史研究中将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和前景。

新编地方志对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和研究参考价值。新编地方志在资料提供、研究写作参考等方面，对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主要表现为体量的庞大性、资料的丰富性和记述的准确性。就体量庞大性而言，至2014年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时，全国第一轮修志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800多部，第二轮修志累计出版规划内三级地方志书1400多部，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4000多部^③。如此巨大数目的志书，蕴含的关于地方、部门、行业和专题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可谓林林总总、浩如烟海。就资料丰富性而言，新编方志收录的大量图片、统计表格和原始文件，是当代史研究重要的—手资料；其对当代各领域历史和现状的记述，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总括性认识、背景知识和研究线索，是宝贵的二手资料。就记述准确性而言，新编方志对一些模糊史实的考订，对一般历史现象提出的专业见解，对重点、难点历史事件的评价和记述，从厘清史实、开阔思路、事件评价和记述方法等方面丰富、充实和推进了当代史的研究写作。

当代史研究者要重视对新编方志的学习、利用和借鉴。新编方志是开展当代史研究的巨大资料库，如果当代史研究者不加重视、不加利用，就会造成修志人员精力的浪费和资源的流失。“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利用志书，有的连看都没有看过；更有甚者，至今不知地方志为何物”^④。从客观要求和研究需求来看，当代史研究者都有必要高度重视新编方志的利用价值。第一，新编方志的资料来源广泛，数量巨大，原样收入或消化写进志

①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共产党志》，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0~11页。

② 段柄仁《二十年改革回顾——对北京市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再认识》，《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③ 王伟光《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④ 朱佳木《加强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书的资料往往要经过精挑细选和甄别分析，都是具有代表性和关键性的资料。对于这些资料，当代史研究者靠一己之力，未必能全看到或全部收集到。第二，经过众手编写和层层严格把关而修成的新编志书，观点是准确的，方法是科学的，史实是确凿的，在符合思想性要求的前提下体现出高度的学术水准。当代史研究者参考借鉴这些观点、方法和史实，自己的研究写作就会站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三，当代史研究对新编志书的利用具有现实紧迫性。从当代档案资料的保存利用来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档案资料基本保存在中央、省市和区县等各级档案馆里，一般都可以查阅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档案资料大多保存在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单位自己的档案资料室里，一般不对外开放查阅。当代史的研究，当然要尽可能去档案馆里查阅重要的一手资料，如为条件所限充分使用新编方志中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也是科学合理的选择。随着当代史研究热潮的兴起，特别是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深入，新编方志服务当代史研究的功能和价值必将日益凸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责编：詹利萍

2015年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2015年11月22日下午，2015年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温捷香，党组成员、副主任丘洪松，副巡视员吕克坚以及全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试点乡镇（街道）相关人员等190多人参会。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建和主持会议。

温捷香指出，自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充分认识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广泛发动多部门参与，主动扩大试点面，部分市县先行先试、初见成效，普查工作扎实推进，开局良好。但也存在个别地区对普查工作的认识不足，工作不够主动，没有按要求落实试点单位，普查工作整体推动较慢等薄弱环节。针对这些问题，温捷香强调，各地要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坚持“各级党委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牵头、有关部门配合、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按照徐少华常务副省长在省第七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部署和经省政府同意印发的《普查工作方案》要求，抓紧制定方案、成立机构、落实经费、抓好试点、抓好培训。各地在2016年2月底前完成试点镇辖区内所有自然村的普查工作，完成普查表填报、普查资料审核、《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调查》初稿编写和总纂、报送普查资料等规定程序。同时，各地要积极承担起本地区，特别是镇、村普查工作业务培训的职责，做好业务指导、督促检查，促进普查工作全面健康开展。

会上，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陈泽泓研究员对普查工作方案和要求进行详细解读和辅导，阳江市、佛冈县介绍了普查工作经验，广州市尚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网络报送系统”进行了介绍和演示。与会领导和专家还解答了现场提问。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China Local Records

No. 1 , 2016

- Important Written Instructions from Premier Li Keqiang** (4)
- Speech during Recep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Outstanding Models from Nationwide Local Records Institutions** *Liu Yandong*(5)
- Recording True History Fairly and Faithfully , and Introducing the Ethos of Elucidating the Good and Repudiating the Evil-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Representatives of Outstanding Models from Nationwide Local Records Institutions** *Wang Weiguang*(7)
- Summary of Conference of Representatives of Outstanding Models from Nationwide Local Records Institutions** (12)
- Seeking the Way of Compiling Local Recor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pilation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An Overview of 2015 New Local Records Forum** (14)
- Summary of the Fifth China Annual Local Records Academic Conference** (18)
- Narrative Commen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cords Compil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Last 30 Years** *Xu Qian*(21)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cord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records and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nurturing campus culture and spirit. Since the start of 1980 ,there has been a great upsurge of campus records compil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cords also gained popularity ,and showed a trend of gradual expansion. Through analyzing factors such as title , level , regional distribution , time of publication and coverage ,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gains and losses in campus records compilation experiences ,made suggestions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future campus records compil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erving the reality attentively and attracting leaders' attention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o intensify campus records promo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eam building and standardizing compilation procedures.

- Narrative Comments on the Values of New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Research—Taking Newly Compiled Beijing Local Records as Examples** *Wang Lei Li Zihua*(28)

Along with the completion of first-rou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work and the expansion of 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work ,the scale effect of new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cord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local records work ,with the function of serv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research more and more strengthened. Beijing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practice shows that there are natural and close connections at the subjects and the time limit between the new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With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mmense amount ,rich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accurate records , new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are of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utilization valu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research in aspects like material preparation ,historical facts clarification ,thought expansion ,event evaluation and recording methods.

Brief Analysis of “Four Kinds of Ganshui Records(澈水志) ” and Their Revelations for Contemporary Township Records Compilation Shi Lei(36)

The earliest township records in existence of our country-Ganshui Records(澈水志) by Chang Tang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completed in Ganpu town of Zhejiang Haiyan. Ganpu used to compile his township records for six times. In the five old ones ,there are four well reserved ,which were compiled respectively in Song ,Ming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roviding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modern people to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ownship records. Trough the research to the existing four old Ganpu records ,this essay holds an opinion that why Ganpu town records could be compiled continually mainly due to the effect Chang Tang’s “Ganshui Records” exerted to ,the promotion by officials ,commercials and gentlemen and the local culture atmosphere of academic admir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essay gives revelations “Ganshui Records” bringing to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township record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during the Age of Prosperity ,and Concerted Efforts in Building Our Spiritual Homeland-On Village and Township Records Compi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okou Village Records (曹口村志)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Qiao Fanghui(44)

The republication and reprint of Caokou Village Records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good situation of prosperous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 local people and plays the role as an example and of pushing forward village and township records compilation work. During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rapid acceleration ,the start and expansion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records compilation bear important significances such as reflecting local geography ,history ,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record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hips; keeping track of local information ,keeping hold of nostalgia ,and building our owned spiritual homeland.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Reconstruction of Liu Xinqi’s Jiaozhou Records(《交州记》) from Quotations Yang Hengping(47)